

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系列: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贸易重大理论与政策研究

总主编 薛荣久

国际经贸理论 通鉴

国际经贸理论中国卷(上册)
中国古、近代国际经贸理论

主 编 陈家勤 陈争平 孙玉琴

*A General Overview of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ress

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系列：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贸易重大理论与政策研究

总主编 薛荣久

国际经贸理论通鉴

国际经贸理论中国卷（上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经贸理论通鉴. 国际经贸理论中国卷. 上册 /
陈家勤等主编.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0

(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系列: 经济全球化进程
中国国际贸易重大理论与政策研究)

ISBN 978-7-81134-698-5

I. ①国… II. ①陈… III. ①国际贸易 - 经济理论 -
研究 IV. ①F7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8635 号

© 2010 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国际经贸理论通鉴
国际经贸理论中国卷 (上册)
中国古、近代国际经贸理论
陈家勤 陈争平 孙王琴 主编
责任编辑: 赵 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邮政编码: 100029
邮购电话: 010-64492338 发行部电话: 010-64492342
网址: <http://www.uibep.com> E-mail: uibep@126.com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成品尺寸: 185mm × 260mm	25 75 印张 595 千字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34-698-5
印数: 001-800 册 定价: 65.00 元

出版说明

为适应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确立科学对外贸易理论和政策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密切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全面深入、系统和完整地介绍、研究古今中外的国际经贸理论和政策，已成为学术界、经济界、企业界和政府决策部门的共同愿望。为此，编著出版《国际经贸理论通鉴》。它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系列：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贸易重大理论与政策研究中的课题。

为了能系统地反映国际经济贸易理论中的流派和各种学术观点，我们采取了如下的编著方法。首先，按时代排列学派和理论发展，把《国际经贸理论通鉴》分为六卷。第一卷为国际经贸理论基源卷，第二卷为国际经贸理论现代卷，第三卷为国际经贸理论当代卷，第四卷为国际经贸理论中国卷（上下册）。为了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贸易理论的研究，还单独编著第五卷和第六卷。第五卷为马、恩、列、斯论国际经贸理论卷，第六卷为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论国际经贸卷。其次，在前四各分卷里，如有既定公认学派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则以学派为主；没有形成学派的则以理论为主。再次，在国际经贸理论内容上，包容各种学派和理论，不分为主流派和非主流派。最后，在编著体例上，作到评介和原文相互结合。在学派评介中，首先介绍学派的形成，主要代表人物的生平、学术活动，主要著述，学术影响；根据需要再把有关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和政策原著摘录在后面。在国际经济贸易理论评介中，首先介绍该理论的发展与形成，主要的代表人物，进而介绍他们的生平、学术活动和代表性的著述与影响。由于涉及内容不同，各卷体例有所差异。

《国际经贸理论通鉴》取材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出版的汉译著作，少部分取自原版著述。其中，主要部分是著作，也有一部分是论文。为了尊重作者、译者和出版社的著作权、翻译权和版权，以及便于读者进一步查阅有关原文，我们在所选原文之后均注明了出处，依次包括作者国籍、作者名、译者名、著作名、出版社名、出版时间和页码。

《国际经贸理论通鉴》总主编为薛荣久。本卷主编为陈家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争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孙玉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参与本卷编著的还有清华大学博士后云妍、张洪云，博士生张顺周、常旭，硕士张洋、丁蹇和唐冬梅；北京大学博士生庄小霞，邵育欣和曹婷婷等。

课题秘书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在读博士生杨凤鸣。

本卷所用材料均为 2007 年 10 月底以前中国公开出版的书籍和刊物。

依照编著研究进度,《国际经贸理论通鉴》各卷采取陆续出版方式。本书属于原创性的研究编著,同类型的著述在国内外尚未发现。恳请有关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予以指正,以便我们再版时进行修正。

总主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薛荣久

目 录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对外贸易思想	(1)
第一节 夏商西周时期对外贸易的萌芽及其贸易思想	(1)
第二节 春秋时期诸子的对外贸易思想	(9)
第二章 秦汉至隋唐时期的对外贸易思想	(31)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对外贸易思想	(31)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对外贸易思想	(43)
第三章 宋元时期的对外贸易思想	(55)
第一节 两宋时期的对外贸易思想	(55)
第二节 元朝时期的对外贸易思想	(80)
第四章 明清(前期)对外贸易思想	(95)
第一节 明代主要的对外贸易思想	(95)
第二节 清前期的对外贸易思想	(118)
参考文献	(142)
第五章 清后期的对外通商有益论	(146)
第一节 洪仁玕的开放救国思想	(148)
第二节 冯桂芬的“裕国”论	(152)
第三节 王韬:“商为国本”与“广贸易”论	(155)
第四节 薛福成:商“握四民之纲”与振兴商务论	(158)
第五节 马建忠:先富后强思想与顺差富源论	(165)
第六章 清后期的“商战”论	(171)
第一节 李鸿章、张之洞与进口替代主张	(177)
第二节 郑观应的“商战”论	(189)
第三节 陈炽、何启和胡礼垣的商战思想	(202)
第四节 康有为的富强主张	(208)
第五节 谭嗣同与自由贸易主张	(215)
第六节 严复与经济自由主义	(220)
第七节 张謇与实业救国论	(224)
第八节 梁启超思想的变化	(230)
第七章 民国时期国际经贸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237)
第一节 孙中山实业救国与对外开放思想	(244)
第二节 穆藕初与漆树芬的国际经贸思想	(256)

第三节	马寅初、武培幹的保护贸易思想	(261)
第四节	唐庆增、张彰、沈奏廷、何炳贤的学术贡献	(268)
第五节	抗战前学界利用外资思想	(281)
第六节	抗战时期利用外资及外贸思想	(289)
第七节	抗战胜利后利用外资及外贸思想	(317)
第八章	近代中国币制与汇率理论	(338)
第一节	有关自铸银元以“抑洋钱”的讨论	(345)
第二节	清末有关实行金本位制及与西方币制接轨的理论	(352)
第三节	北洋政府时期有关币制与汇价的论争	(358)
第四节	国民党政府时期有关币制与汇价的论争	(369)
参考文献		(404)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对外贸易思想

作为一个拥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古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很早以前就与其他地区发生了经济联系，这种联系甚至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晚期。可以说，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极其悠久，影响深远，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漫长的历史中积累起来的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思想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宝贵财产，是中国古代伟大思想结晶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思想可以追溯到三代的夏商周时期。著名经济史学家胡寄窗先生指出，“殷商奴隶社会及它以前的经济思想，由于史料的缺乏，无法做较详细的探讨”^①，如夏商西周时期的史料只有《尚书》、《逸周书》及殷商甲骨文等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存在，记载既少，且有些史料的可信度有限，远远不能完全反映当时社会的经济思想，所以三代以前甚至三代这一段漫长时期的经济思想，包括对外贸易思想，难以详加叙述，只能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而已。

西周晚期，周幽王为犬戎所杀，西周国势衰微，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迁都洛阳，史称东周，从此历史开始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周天子渐失威信，诸侯国兼并加剧，政治经济经历各种大变革，如以春秋时期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公元前 594 年）实行的按亩征税的田赋制度为标志的土地制度变化是承认私有土地合法化的开始。春秋时期，牛耕和铁农具的普及和应用，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交通的发达，促进了商品经济的活跃，当时诸侯国之间往来贸易频繁，中原地区同域外的联系渐次展开，早期的对外贸易开始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思想争鸣的局面，诸子百家思想活跃，著述丰富，他们中的很多人留下了许多关于经济问题的著述，其中涉及当时的一些对外贸易思想与主张。

第一节 夏商西周时期对外贸易的萌芽及其贸易思想

一、夏商西周时期对外贸易的萌芽

夏（约为前 21 世纪 - 约前 17 世纪）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从夏禹开始，一直到夏桀覆灭，共十四世，十七王。夏朝的活动中心在今河南中西部地区，夏的势力一直延伸到黄河南北，甚至到达了现在的长江流域地区。

在夏代，农业与手工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畜牧业也有一定发展，制陶业、造

^①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第 1-2 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车业都出现了,手工业中还有酿酒业的发展,传说夏禹的大臣仪狄发明了酒,“昔者帝女令仪狄造酒,进之于禹”^①,酒的发明,显示了当时生产的进步,农业的进步发展,才有更多的原材料可以进行酒类加工。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扩大,这是夏朝商业萌芽发展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才出现了早期对外贸易的萌芽。恩格斯说:“起初交换是在部落与部落之间由各氏族族长来进行的……”^②这种早期原始部落之间以交换的形式互通有无,同时也是历史上比较原始的对外贸易的历史源头,夏朝也基本上遵循了这个规律。夏是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部落之间的交换非常频繁,“根据考古发现在现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可能就是夏朝都城所在地,发现有贝、玉、松绿石等装饰品,这些装饰品并非当地所产,应该是通过贡赋或者交换从远方而来。”^③根据考古情况可以说早在夏的时候,已经有明确证明出现了最初的对外经济联系了。通过将考古发现与史籍记载相互印证,证明确实如此。在先秦古书《竹书纪年》中就多次记载了夏的时候远方方国来朝,证明当时夏与各方国之间交往频繁:

(后相)七年,于夷来宾。^④

后少康即位,方夷来宾。^⑤

后(芬)〔芳〕即位,三年,九夷来御,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⑥

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⑦

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再保庸会于上池,诸夷入舞。^⑧

以上为《竹书纪年》所载,又《左传》述“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⑨,杜预注云:“使九州之牧贡金”^⑩,是说当时的夏与远方各国建立了最早的经济联系,虽然这种联系是以“贡赋”的形式为主,贡赋就是夏王朝直接或间接统治区内的诸侯、方国或部落向夏王朝进贡。《史记·夏本纪》记载了当时各地的特产和珍奇异宝,如瑶、琨、竹箭、熊、罴、狐、狸、织皮等,夏朝建立后,通过“贡赋”的方式,远方的部落将各地土特产送到夏王所在的都城,这种“贡赋”的方式可以说是最早的国家贸易形式。夏朝接受贡物的之后,则应以冀州的物产加以赏赐,因而这种贡赋实质是夏王朝与其统治区外的物物交换,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外贸易的萌芽。

商朝(公元前17世纪-前11世纪),商的建立者是商汤,最后一位王是商纣,商朝十七世,共三十一王。商人是个富有商业传统的部族,英文当中 trade 和 commerce 两

① (西汉)刘向集录:《战国策·魏策》,第8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版。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54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版。

③ 张一农:《中国商业简史》,第3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

④ 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⑤ 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⑥ 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⑦ 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⑧ 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⑨ 《左传·宣公三年》,引自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669页,中华书局,1990年5月第2版。

⑩ 《左传·宣公三年》,引自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669页,中华书局,1990年5月第2版。

个单词都有商业、贸易的含义，而在中文中相对应的“商”，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这可能与商朝人有关，“商人”这一名词固定成为做买卖的人的专有名词，这也极有可能与商人的职业有关。如郭沫若认为“殷人的商行为无疑是已经开始了。《周书·酒诰》称妹土人‘肇牵车牛远服贾’，肇者始也，可见在周初人的眼目中认商行为是始于殷。大约就因为这样，所以后世称经营这种行为的人便为‘商人’的吧。”^① 因为商人经营商业，所以后世把这种经营商业的一类人，称之为“商人”，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现在，商人在经营商业上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商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一直是与商业贸易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商人有经营畜牧业的传统，商人的祖先以从事畜牧业为主要生存手段，《世本·作篇》记载：“相土作乘马”、“胲（亥）作服牛”，《山海经·大荒东经》中称：“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楚辞·天问》记载：“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祿，不但还来？”就是讲商人的祖先王亥善于驯服马车，他用牛车载着货物，曾到了有易地区进行交易，为有易之君所杀，被有易之君夺去了牛车和货物。《诗经·商颂·长发》叙述商王朝的先祖“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就是说商人的祖先相土的活动范围，不仅在中原以内，甚至到了“海外”，当然这里的“海外”很可能只是指现在辽东半岛地区或者朝鲜半岛。《管子·轻重戊》中称：“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商人很早开始经营畜牧业，而且很早就有了经商的传统，经济贸易加强了商民族的经济势力，促进了商民族的发展。

商人灭了夏以后，继承了夏代的贡赋传统，当时商朝和其周边方国的联系非常紧密，《竹书纪年》记载成汤之时，“诸侯八译而朝者千八百国，奇肱氏以车至。”^② 《诗经·商颂·殷武》称：“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就是讲述商的周围部族向商朝朝见、贡献物品。

除了“贡赋”形式以外，商朝与域外其他方式的经济联系也加强了，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考古发现了商朝与域外的物质交换的直接证据，证明当时商朝与域外存在早期的贸易关系。

20世纪初，一项重要的考古发现就是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其中闻名于世的殷墟甲骨文，为人们认识商代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不仅如此，考古学者还在安阳挖掘出大量商代文物，1976年在安阳小屯大墓发现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人，玉人是用黄褐色的和田玉雕成，和田玉在先秦时代被称为“昆山之玉”。所以根据这个线索，一些学者考证认为殷商时代就有一条为贩运“昆山之玉”而开辟的东西交通路线，该路线西这条交通线是以新疆和田为中心，向东西两翼运出和田玉。向东的路线自新疆和田一直延伸到黄河流域殷商的政治中心安阳。具体走向是经塔克拉玛干沙漠通道，沿河西走廊或北部大草原向东行进到达中原地区；向西的路线则是由新疆和田翻越帕米尔高原经中亚一直到达近东的巴格达。这条早期输送玉石的“玉石之路”远远早于汉武帝时期张骞

① 郭沫若：《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卷上》，引自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2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出使西域“凿空”的“丝绸之路”，它是先秦时期中外对外贸易的重要证据。

在“丝绸之路”开辟以前，“玉石之路”可以说是沟通早期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最重要的通道。实际上，在先秦古籍中多次出现过这条“玉石之路”的记载，如在古书《穆天子传》中就记述了周代周穆王沿着这条道路西征。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和田玉人，证明至少从商代中晚期开始就有大量和田玉通过“玉石之路”涌入中原黄河流域。另外，甘肃、青海地区齐家文化等遗址出土的和田玉，以及其他越来越多的材料表明，很可能在史前时期（距今6000-5000年前）就已形成了这条从和田出发向东运输玉石的路线。此外，从考古发现来看，比和田距中原更远的前苏联和蒙古地区都挖掘出来许多与同时期商朝的产品有惊人相似之处的青铜器和陶制品中，在制造工艺和形状构造方面都与中原境内发现的商代器物相似，虽然没有史籍记载，但是作为考古证据，可备一说。^①交通的发展，促进了贸易的进步，在商周一直到战国时期，“玉石之路”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极大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商朝之后是周朝，周朝（公元前11世纪中期-公元前256年）存在约有800年。共传30代，37王。周的国力强盛，与西北少数民族以及更远地区的联系也紧密了许多。周成王（前1115-前1079年）平定商代遗民的叛乱后，四邻各族的使臣前来朝贺，其中就有来自中亚渠搜（今费尔干纳）和康居（今撒马尔罕）的使臣。先秦古书《穆天子传》讲述周穆王（前1001-前947年）巡游天下的故事，其中就记载了周朝与西亚、中亚地区的经济往来。《穆天子传》一书的主要内容是讲述周穆王从镐京（现在的西安）出发，向西方长途跋涉，并见到西王母。沿途之中，周人用币帛、铜器与各地部落进行交换，每到一处，穆王就赠送给当地的部落酋长丝绢、铜器和铁币，酋长们也回赠了大批的牛羊和玉石，这与后代的官方组团贸易非常相似。虽然《穆天子传》长期以来被归入小说类，但其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在《左传》、《竹书纪年》、《楚辞》等记载有先秦历史的文献中，都曾提到周穆王西巡事件，而且《穆天子传》中对新疆及中亚地区的情况都有涉及。因而一些学者认为“以为《穆天子传》一书所记载周穆王西行之事为经典所不载的说法，是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的。”^②所以对此书，“当然不能忽略它反映中国古代早期域外交通的意义”。

商周时期，中原的冶铜、制陶和养蚕缫丝都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中原所产的精美的青铜器、陶器和丝绢，吸引着天山南北的游牧民族，也成为中原地区向西输出的主要商品。中国古代的原始商业萌芽于夏，发展于商周，夏商周时期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这一时期，不仅有中原统治区内部的贸易，也有与外部的贸易，甚至有与中亚间的贸易，这些贸易已构成古代对外贸易的萌芽。反映这一时期部族间贸易的思想亦构成中国古代对外思想的滥觞。

二、夏商周时期带有对外贸易色彩的“贡赋”思想

夏商西周时期，尽管限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特别是交通等条件的限制，中外经

① （苏）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② 黄留珠主编：《周秦汉唐文明》，第一版，第97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

济联系尚具有偶发性,此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尚处于萌芽状态。但在这一时期一些先贤智者的思想中关于对外贸易的主张亦已初露端倪。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以“贡赋”为中心的对外贸易思想,“贡赋”这种交换方式自夏商周肇始,这种特殊的官方贸易逐步演化为中国的朝贡贸易体系,一直延续到清朝。《广雅·释言》曰:“贡,献也。”“贡赋”是早期史籍文献中留下来的关于三代与其他国家之间政治经济联系的一种主要方式,“贡赋”是早期史籍文献中留下来的关于三代与其他国家之间政治经济联系的一种主要方式,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支配下,认为周边民族区域、其他国家都是天子的属臣,必须向中央进献物品,表示臣服。夏商周时期,史籍中所留下的许多史料是都是有关“贡赋”的,在以“贡赋”名义下,展开了一种特殊的对外贸易。如“成汤时四方民族都来朝献,带来各自和从远方交换所得的异物,他们来到商朝都城,通过交换得到了他们所需要和喜爱的各种青铜制品。其中来自北方和西方的共有十多个民族,商文化依靠这些分布在北方和西北的草原游牧民族,传入叶尼塞河、阿尔泰山和吐鲁番盆地。在北方的道路中,鄂尔多斯和阴山附近的漠南草原正处于十字路口,向西通过居延海南部可以进入天山北麓,直至伊犁河流域;向北通过蒙古到达贝加尔湖和它以西的萨扬——阿尔泰一带。所以商代青铜文化和西北草原民族有密切的联系,通过草原民族的传播,在西伯利亚地区和欧洲的塞伊玛文化、中亚的纳马兹加文化发生了最早的接触。”^①夏商周时期,史籍中所留下的主要是在“贡赋”这种“外衣”笼盖下的对外贸易思想,这一时期具有早期贸易思想的代表者主要是当时的统治者,夏禹、商汤、伊尹、周文王、周公旦等人。

(一) 夏禹的“贡赋”对外贸易思想

夏的建立者是禹,禹,姒姓,也称大禹,夏后氏部落的首领。在中国历史上的尧舜传说时代,黄河流域发生了大洪水,当时的氏族部落首领尧命禹的父亲鲧领导治水,鲧用“障水法”以堵截的办法治水,治水九年而不成功,被杀于羽山。舜即位后,命鲧的儿子禹继续负责治水,禹以疏导的方式、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终于治水成功,“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绛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②禹平定洪水之后,促进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禹平洪水,定九州岛,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棐,楙迁有无,万国作义。”^③禹也因为治水的功绩,而成为舜的继承人。夏禹治理洪水以后,分天下为九州,发展农业,为商业交换提供了基础;疏导河水,便利了各地通过献贡的形式,将各地的特产都输送到中央。

“贡赋”作为一种时代政治产物,亦是这一时期对外贸易的特殊形式。因而夏禹的对外贸易思想主要集中在各地诸侯方国的进献的方式与原则。传说夏禹曾召集诸侯于会稽(今浙江绍兴)进行“会计”,“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

① 冯天瑜等著:《中华开发史》,第一版,第6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

② 《尚书·禹贡》,皮锡瑞撰:《今文尚书考证》,中华书局,1989年12月第1版。

③ (汉)班固:《汉书·食货志》,第1117页,中华书局,1962年。

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①说的就是夏禹命令各地方国向自己进献表示臣服。“夏成五服,外薄四海。”^②各地的方国通过贡赋的方式向夏王朝表示臣服,“无怠无荒,四夷来王。”^③夏禹通过便利交通,方便了方国之间及夏王朝的交通。与此同时他明确提出各方国诸侯进献各地特产应因地制宜,发挥各地资源禀赋优势,“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④通过这些措施,夏王朝占有了四方各地的宝物和特产,据史籍记载“(禹)修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氏、羌来服。”^⑤远方各国向夏朝进献物品,夏王朝成为天下物品的占有者,“禹成五服,齿革羽毛器备”^⑥。就是说夏禹的时候,由于夏朝的控制领域很广阔,通过各地基于各自拥有的资源禀赋向夏王室进贡,夏朝拥有了各地的丰饶物产。

(二) 商汤、伊尹与《四方献令》所反映的对外贸易思想

成汤是商部族的杰出首领,他建立了商,在殷商甲骨刻辞中成汤被称为大乙、高祖乙,后世又称其为商汤。伊尹是商朝初期著名的贤臣,姓伊字尹,名挚,初仕夏桀,后来辅佐成汤,帮助成汤取得天下,是成汤最得力的助手。

相传商的建立者成汤还没有得天下时,伊尹为成汤分析政事,其中就以厨事为喻,讲天下之道,伊尹提到了四方各地所产的做菜原料,“菜之美者,昆仑之苹,寿木之华,指姑之东。中容之国,有赤木玄木之叶焉,馥膻之南,南极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树,其色若碧,阳华之芸,云梦之芹,具区之菁,浸渊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阳朴之姜,招摇之桂,越骆之菌,鳖鮓之醢,大夏之盐,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长泽之卵。饭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阳山之稌,南海之秬。水之美者,三危之露,昆仑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摇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实,常山之北,投渊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甘栌焉,江浦之橘,云梦之柚,汉上石耳。”^⑦伊尹以丰富的知识,讲述了产于各地的不同的绝美特产。

伊尹进一步对成汤说,这些绝美的美食佳肴,如何能够得到呢?伊尹说“君之国小,不足以具之,为天子然后可具。”“非先为天子,不可得而具。”^⑧所以,只有成为天子,才能得到这些物品。伊尹说现在因为成汤控制的区域狭小,所以不能具备,如果成汤成为天下的统治者,这些美食自然就可以具备了。伊尹之所以强调必须成为天子才能据有这些佳菜美食,就是因为这些佳菜美食都是四方各地的特产,只有成为天子,通过贡赋的方式,才能获得,这正是商周时代贡赋贸易的反映。即由于各地物产差异,只有通过交换才能满足需要,但在商品经济尚不活跃的状况下,需要一定的政治力量的促

① (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第89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② 《尚书大传》卷三《夏传》,(清)皮锡瑞撰:《尚书大传疏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光绪丙申师伏堂刊本。

③ 《尚书·大禹谟》,(清)皮锡瑞撰:《今文尚书考证》,中华书局,1989年12月第1版。

④ (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第51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⑤ 《大戴礼记·少闲》,(清)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

⑥ (汉)桓宽著,王利器点校:《盐铁论·力耕》,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⑦ 《吕氏春秋》卷十四,高诱注,上海书店,1991年。

⑧ 《吕氏春秋》卷十四,高诱注,上海书店,1991年。

动。伊尹以此激励成汤夺取天下，成为天下共主，从此事例也可以看出，“贡赋”形式的贸易成为当时中原地区物资流通的一个重要途径。

商朝建立后，商汤命伊尹制定了与“贡赋”直接相关的《四方献令》。《四方献令》的主要内容就是规定诸侯、方国向商朝贡献的方式。商代采取的是实物贡献的方式，各地诸侯、方国需向中央进贡实物，在颁布《四方献令》之前，如果中央指定各地诸侯、方国向中央进献牛羊，但是当时如果有些地方并不产牛羊，所以为了进贡牛羊，这些地方就需要将本地所产物品拿去先换取牛羊，然后才可以顺利进贡，这样周转下来既增加了进贡的成本，又因为物品搬运，极为不便。“诸侯来献，或无牛马之所生。而献远方之物，事实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势所有而献之。必易得而不贵。其为四方献令。”^①亦即若不顾各地出产明确规定各地进贡的物品品种，将导致进贡成本过高，不利于贡赋贸易的开展。因而商汤命令伊尹颁布了《四方献令》。《四方献令》中规定：

伊尹受命，於是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沕深、九夷、十蠻、越沕、滂發、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鞞，鰓之醬鮫，利刃為獻。正南瓠鄢、桂國、損子、产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玕玳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正西昆侖、狗國、鬼亲、枳已、闍耳、貫胸、雕題、离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純罽、江历、龙角、神龟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代翟、匈奴、樓煩、月氏、嬖犁、其龍、东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駒騊、駃騠、良弓為獻。”^②

《四方献令》规定了各地诸侯可以不以中央指定的实物进贡，而是依据各地特产，因地制宜，献上本地特产，如东方的方国贡献鱼支之鞞、鰓之醬鮫、利刃等物品，南方的方国献上珠玕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西边的方国献上丹青、白旄、纯罽、江历、龙角、神龟，北边的方国献上橐驼、白玉、野马、駒騊、駃騠、良弓。《四方献令》的颁布方便了各地诸侯、方国，同时商王朝也可以获得全国各地丰饶的物产，互利互惠。

三、周文王和周公的鼓励四方游旅的对外贸易思想

周文王姬昌，是商末周族领袖，古公亶父之孙，季历之子，西周的奠基者，周文王为周武王灭商奠定了基础，是周族发展中一位有很大影响的重要人物。周文王在位时发展生产，增强国力，为周灭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文王在位期间，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重视商业发展，鼓励商旅贸易。周初曾一度遭遇荒灾，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于是周文王昭告四方游旅，颁布了《告四方游旅》，鼓励发展商业。《告四方游旅》集中反映了周文王对商业贸易的思想态度。《告四方游旅》规定：

四方游旅，旁生忻通。津济道宿，所至如归。币租轻，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资贵贱，以均游旅，使无滞。无粥熟，无室市，权内外以立均。无蚤暮间次均行，均行众

① 《逸周书》卷七《王会》，孔晁注，中华书局，1985年。

② 《逸周书》卷七《王会》，孔晁注，中华书局，1985年。

从, 积而勿口。以罚助均, 无使之穷。平均无乏, 利民不淫。无播蔬, 无食种, 以数度多少省用, 祈而不宾。祭服漱不制。车不雕饰, 人不食肉, 畜不食谷, 国不乡射, 乐不墙合。墙屋有补无作, 资农不败务。非公卿不宾, 宾不过具。哭不留日, 登降一等。庶人不独葬。伍有植, 送往迎来亦如之。有不用命, 有常不违。^①

周文王的《告四方游旅》不只是针对当时周境内的百姓, 而是四方地区, 包括当时各个方国甚至更远地区的商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告四方游旅》是周文王发展周族对外贸易的政策, 亦是周文王对外贸易思想的集中反映。周文王在《告四方游旅》中, 明确宣告鼓励各地的商旅来周地进行通商, 进而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的措施, 如修葺道路, 方便交通, 准备了可以“所至如归”的旅舍, 制定合理的货币政策等等。周文王时, 还有一些促进商业发展的措施, 如不征关税, 孟子说“昔者文王之治岐也, 耕者九一, 仕者世禄, 关市讥而不征, 泽梁无禁, 罪人不孥。……而不征商贾之税也。”^②通过这些措施, 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为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政策基础。其中“关市讥而不征”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成为此后鼓励商业发展的带有自由贸易色彩的思想先驱。

周公, 名旦, 周文王之子, 武王之弟, 因其以周太王所居地为采邑, 故称周公。周公初辅佐武王, 周武王灭商以后不久去世, 年幼的成王继位, 周公作为成王的叔父辅佐成王执政, 一度成为周的实际统治者, 周公为此提出了一套颇为系统且行之有效的政治理论, 对周朝和后世都影响深远, 特别是对儒家影响很深, 周公也被儒家认为是圣人的典范。

周公鼓励百姓经营商业, 《尚书》中记载了周公训示聚居在妹土的商朝遗民在农闲之时, 牵着牛车, 到远方去做生意, 赚钱孝养父母, “肇牵车牛, 远服贾用, 孝养厥父母, 厥父母庆, 自洗腆, 致用酒。”^③妹土的商朝移民这种牵着牛车去远方贸易的行为, 不属于本地区小市场上百姓之间互相以物易物的调剂余缺、调剂品种, 而是一种长距离的商业贸易活动, 这种活动有可能就是早期的私人对外贸易活动, 而周公显然对这种行为是鼓励支持的。此外, 周公还制定颁行了优待商旅政策措施:

周公曰: “闻之文考, 来远宾, 廉近者, 道别其阴阳之利, 相土地之宜, 水土之便。营邑制命之曰: 大聚先诱之以四郊, 王亲在之。大夫免列以选, 赦刑以宽, 复亡解辱削赦□(原文如此)重, 皆有数, 此谓行风。乃令县鄙商旅曰: 能来三室者, 与之一室之禄。辟开修道, 五里有郊, 十里有井, 二十里有舍, 远旅来至关, 人易资, 舍有委。市有五均, 早暮如一, 送行逆来, 振乏救穷。老弱疾病, 孤子寡独, 惟政所先。民有欲畜, 发令。”^④

周公在命令中, 提出了鼓励商业贸易的一些具体措施, 包括整修道路、为商旅提供旅舍等。周公明确提出了要以优厚的条件吸引商旅经商, 特别是远方商旅, 即所谓的

① 《逸周书》卷十一《大匡》, 孔晁注, 中华书局, 1985年。

② 《孟子·梁惠王下》, (汉)赵岐注, (宋)孙奭疏:《孟子注疏》, 中华书局, 1980年。

③ 《尚书·酒诰》, 皮锡瑞撰:《今文尚书考证》, 中华书局, 1989年12月第1版。

④ 《逸周书·和寢》, 孔晁注, 中华书局, 1985年。

“远宾”。周公还特别下令对周境以外的商人给予优厚的待遇，“能来三室者，与之一室之禄”，并且保证保护商人的利益。

综上所述，周文王的《告四方游旅》和周公的鼓励商业贸易的言论、命令是周贵族统治者中先进的经济思想的反映，其主要内容都是鼓励商业、保护商人利益，由于时代的局限，这种政策主张尚颇为简单粗糙，但其毕竟是中国鼓励包括对外贸易在内的商业活动之始，对后世无疑影响深远。

第二节 春秋时期诸子的对外贸易思想

一、春秋战国时期对外贸易发展概况

公元前 770 年，周厉王政治腐败，不得人心，当时的少数民族犬戎攻入西周都城镐京，西周灭亡。不久，周平王东迁洛阳，历史进入东周时代，从此开始至秦始皇公元前 221 年统一中国为止，一共 550 年，一般统称为春秋战国时期。其中从公元前 722 年起，因为鲁国撰有编年体史书《春秋》的缘故，史称春秋时期（前 722 - 前 403）。战国时代则自公元前 403 年开始至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公元前 221 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大变革时代。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比起夏商周时期，商品经济更加活跃，诸侯割据的局面使原有的统一时期的国内贸易的在性质上变成了国与国之间的对外贸易，同时中原地区与域外的经济联系已得以继续发展，由此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对外贸易，而且由于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发达，学术争鸣成为风尚，这一时期涌现了很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们在对现实的思考与政策实施中形成了丰富的对外贸易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都有很大进展，经济力量逐步超过了夏商周时期，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商品经济更加活跃。主要表现为，四方土特产开始大量交流，商业发达，出现了跨国经商的大商人，如陶朱公范蠡、孔子的学生子贡端木赐、秦国仲父吕不韦等，这些大商人财富可以媲美王侯。社会上产品丰富，农民除了粮食、布匹、蔬菜之外，农具等实用物品都需要向市场购置，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出来的多余商品，都投放到交换领域进行商业交换。商业的发展，使地区之间商品交换大大扩展起来。许多地区都有自己的土特产，当时的文献《禹贡》罗列了各州的物产，都是各州出产最多、最好的产品，反映地区商品流通已有了必要的基础。地区商品流通的发展，不仅满足了各诸侯国统治者的奢侈性需要，而且还解决了劳动者一般性生产及生活需求，促进了各地区生产的发展，促使全国各地在经济上融为一体，为封建生产方式在全国确立统治地位，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确立开拓了道路。以盐为例，产地是齐国，销地则是梁、赵、宋、卫，“彼尽馈食之也”^①。

先秦时代，商业发展，交通也更加发达，进一步促进了物品交流，中原地区各诸侯国之间贸易联系紧密，当时人称“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②

① 《管子·轻重甲篇》，马非百著：《管子·轻重篇新论》，中华书局，1979 年。

②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自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 5 月第 2 版，第 1120 页。

当时地处南方的楚国盛产羽毛、齿革等物品,通过远途贸易,楚国的木材和皮革已远销统治区域中心在现在山西的晋国,南北经济交流频繁。“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鼉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①这是战国末年李斯向秦王上书的《谏逐客书》中所提到的情况,可知当时诸侯国之间乃至中原地区与西域地区交流频繁,物资互通,所以虽然秦国不产这些宝物,无论是昆仑之玉,随、和之宝等,但是秦王却可以一一得到。

先秦时期贸易行为普遍,即使是封君亦参与到贸易活动中,楚怀王的弟弟鄂君昭阳,不仅是楚国的大司马、柱国,同时也是一个大商人,他拥有一支陆路可带50乘车、水路可带150艘船的商队,从事大型的贸易活动。1957年在安徽寿县邱家花园出土的青铜制的铜简“鄂君启节”^②,就是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楚怀王颁发给鄂君昭阳的航运通行证,共有铭文163个,上有铭文曰:“得其金节则勿征”、“不得金节则征”。《鄂君启节》记录这支商队从鄂地出发,出汉水,经长沙,入耒水,南向鄱,抵洮阳,水陆并进,行商于今湖北、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广西等地。商队持有用于免税的《鄂君启节》,只要出示金节,即可免征关税,通行无阻。

中原各诸侯国间贸易的发达,为中原地区与周边民族及域外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左传》记载了春秋时期晋国与戎族的经济关系,“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③可知当时人们很热衷于与周边民族展开贸易。此外,山西侯马的战国墓穴中发现的装饰有动物纹理的带钩,则与公元前8-前4世纪活跃于黑海北岸到西伯利亚的斯基泰人的饰物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物品仍然继承先周以来的传统,以丝绸为主。春秋战国时期,秦穆公命手下人和陇西一带的游牧民族进行经济交往,以币帛换取西域各族的牲畜、毛皮、玉石等。此时中国丝绸开始大量输出,中国人因此在欧洲被称作赛里斯人,所谓“赛里斯”实际是古希腊人所说的绢。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阿里斯托芬、亚里士多德等在作品中对丝绸、绢等来自遥远东方中国的纺织品均有一定反映。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考古学家在斯图加特的霍克杜夫村发掘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古墓时,在人体骨骼上发现中国丝绸残片。此外,在古希腊出土的器皿上也有很多彩绘人像身着中国丝绸,可以证明在当时,来自东方中国的丝绸已经到达了希腊等地。

先秦文献《战国策·赵策》里比较明确地讲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西域交通路线。该书中有一封纵横家苏秦替当时东方的齐王写给三晋中的赵王的书信。信中说:假如秦兵占领了勾注山,切断恒山(今山西北部)一线,则昆山之玉不复为赵王所有。这样,代马、胡犬和昆山之玉三种西域宝物,就到不了赵国了。^④赵国北境在雁门关,坐落于山西北部北岳恒山之中,当时是鄂尔多斯草原进入中原的门户,也是古代中原农业区与草原游牧区的分界线。这条在三代时期就曾出现的玉石之路,此时依然非常活跃,这条道路极有可能仍然密切联系着当时对西方的对外贸易活动。

据史书记载,公元前5-公元前3世纪,云南和四川等地就已经和南亚的印度有贸

① (汉)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第2543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② 详见《考古》,1963年,第8期。

③ 《左传·襄公四年》,引自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939页,中华书局,1990年5月第2版。

④ (西汉)刘向集录:《战国策·赵策》,第6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版。